

编者按：“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环球时报》刊发了一组有关软实力的文章，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本刊经征得该报同意，对这一组文章予以转载，以供参考。

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

阎学通

文化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增强一国的软实力，文化实力的削弱并不必然削弱一国的软实力。

政治实力的增长会带动文化实力的发展，但文化实力的发展则不必然带动政治实力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文化实力发展的大国也有走向衰败的。

以政治实力为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以经济实力为综合国力的基础。

自中国政府于2005年9月提出促进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以来，国内有关软实力的讨论越来越多。在《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版，笔者已发表过两篇有关软实力的文章。近来笔者发现，“软实力”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为是“文化实力”。为此，笔者就软实力核心要素及如何增强我国软实力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文化实力 软实力

文化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增强一国的软实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关于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软实力的论述在我国影响很大。其积极作用是促使人们思考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他没有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做文化实力与政治实力的区分，因此产生了误导，人们将软实力理解成为文化实力的负面作用。文化实力包括了全民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媒体、电视电影、服装饮食等很多方面。苏联的文化实力在1991年远大于1951年，但文化实力的增强却未能维持国家的完整。古巴、朝鲜、越南和许多非洲国家的文化实力都远小于苏联，但这些国家却能在冷

战后生存下来。美国的文化实力在2003年大于1990年，但美国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时的国际动员能力却远小于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

文化实力的削弱并不必然削弱一国的软实力。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削弱了我国的文化实力，但中国却在1971年得到第三世界的广泛政治支持，恢复了我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权力，使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大为提高。1978年我国文化实力与文革后期相比并无明显提高，而改革开放政策却一下子为我国争取到了国内外广泛的政治支持，我国软实力明显大增。从长期历史发展看，一国的文化实力普遍是处于上升趋势的，但国家的软实力则时强时弱。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大清王朝的文化实力都是不断上升的，但它们都走向了衰败。依据上面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得知，文化实力是软实力的构成部分但却并非核心要素。

软实力的特点是让别人自愿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软实力和硬实力的最根本区别是软实力使受力者自愿行动，而硬实力使受力者被迫行动。如医生开出药方，病人会自愿去购买，而警察开出交通罚单，司机就被迫交款。军事强迫和经济处罚都是让别国被迫接受一国的政策。有人认为经济援助是诱惑不是强迫。经济援助虽与军事打击不一样，但不给或停止援助实质上也有强迫的性质。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的作用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不同，就在于它们是通过潜移默化影响，使受影响者自愿支持一国政策。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和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信的政治思想，都是以人们自愿接受为前提，促使

别人接受一国政府政策的。布什政府政策使美国软实力下降，并非美国的文化实力下降，而是美国的政治信誉下降。布什政府假造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单方面退出美国自己宣传为世界和平基石的《反导条约》，违反《不扩散条约》与印度进行核合作。这些政策使美国失去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盟友的信任，因此其软实力严重下降。

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实力。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都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但两者性质不同。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实力，后者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性质相同。政治实力包括了领导人意志、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国家战略、决策程序等多方面。政治实力是运用文化、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操作性实力，没有了政治实力，任何资源性的实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例如，以往200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多次分裂与统一，强盛与衰败，与这些历史事件相联系，我们看到的是政府政治实力的升降先于事件之前，而文化实力的变化则在事件之后。即使我们最自豪的汉唐文化也未能防止这两个朝代的衰败。这说明，没有政治实力，文化实力没有意义，而没有文化实力，政治实力仍可独自发挥作用。例如，如果把农民种地的能力比作政治实力，其科技知识就是文化实力。有了科技知识，农民能提高产量，但没有知识也能种地。只有科技知识而不会种地的人是种不出粮食的。

软实力=政治实力×(1+文化实力)。综合国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积，即硬软实力的任何一方为零时，综合国力都等于零。但在这个公式中，软实力却不是政治实力与文化实力的简

单相乘,如果文化实力为零,软实力依然存在,但一旦政治实力为零,软实力则等于零。因为一个只有政治实力而没有文化实力的国家照样拥有软实力。任何一个新独立而不具备文化体系的国家,一旦被联合国接纳,就有了在联大的投票权,也就具备了软实力。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新独立的小国都是这种情况。本段的软实力公式表达了三个概念:1)没有政治实力,文化实力是起不到软实力作用的;2)没有文化实力,政治实力可独自起到软实力的作用;3)文化实力与政治实力的增长都有利于软实力的增长,但政治实力是根本。如果深入探讨我们还会注意到,政治实力的增长会带动文化实力的发展,但文化实力的发展则不必然带动政治实力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文化实力发展的大国也有走向衰败的。

政治实力的核心是政治信誉

国际政治实力的核心是战略信誉。从范围上讲,政治实力包括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动员能力。国内动员能力是让本国人民自愿支持政府政策的能力,国际动员能力是让他国自愿支持本国政策的能力。从内容上讲,政治实力包括了权力和信誉两方面。国际政治实力的权力包括了一国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拥有的法定权力,如参与权、投票权、提案权、否决权等;战略信誉则是其他国家对他国执行其所宣示的政策的可信性的判断。信任的国家越多,一国的战略信誉就越高,否则反之。战略信誉高的国家盟友多,战略信誉低的国家盟友少。冷战时,美国的战略信誉高于苏联,因此北约的团结程度高于华约。冷战后德国的战略信誉高于日本,因此德国在欧洲有很多盟友,而日本在东亚是孤立的。我国战略信誉也是处于变动中的,2005年我实行的和谐世界外交政策提高了我战略信誉,这使得我国目前的国际动员能力也强于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

一国战略信誉建立在他国信任的基础上。战略信誉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国相信某国有决心履行其所宣示的政策,不会欺骗;二是他国相信某国有能力实现所宣示的政策,不会失

败。缺少其一,他国都难以自愿支持一国的政策。信誉从正面讲保护盟友,从反面讲就是处罚敌人。即盟友认为支持一国政策可以获益,敌手相信不接受一国的政策必将受罚。冷战时美苏对盟友提供的核保护伞以及相互的核威慑战略都是建立在这两个条件之上的。缺少其中一项,美苏就达不成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其盟友也不会依靠他们提供的核保护。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退出北约自行发展核力量,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为欧洲国家进行核报复意愿的信任。

他国对一国的信任以该国近期历史为基础。某国的政策是否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取决于该国近期的历史行为。最近的行为对别国的信任影响最大,越久远以前的行为影响力越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虽然在伊拉克战争中提供了非战斗支持,但从没进行过战争,中国自1984年以后没进行过战争,而美国和以色列则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不断地卷入战争。以色列2006年刚对黎巴嫩发动了一场战争,美国还在进行着伊拉克战争。因此,目前不会发动战争信誉最高的是日本,其次是中国,以色列和美国则没有不发动战争的信誉。反之,发动战争的信誉可靠性排序则是美国、以色列、中国和日本。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舆论有关美国会大范围轰炸伊朗的猜测很多,以色列会炸伊朗核设施的较多,中国大陆会军事惩罚“台独”的较少,日本会炸朝鲜核设施的很少。

将增强我软实力的重点置于提高政治实力上

将增强政治实力作为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点。开展国家间的文化年活动有利于外国人了解中国和认识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国人就因此喜欢中国和支持我国政策。在那些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外国专家中,有很多都是喜欢中国文化的,甚至是中文讲得很好的。依据上述分析,为了有效地增强我国软实力,我增强软实力的工作重点可考虑从推广中国文化转向提高国家战略信誉。国家战略信誉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对于崛起大国来讲,比经济利益要重要得多。为此,

在战略信誉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采取经济利益服从于战略信誉的原则,将有利于我国较快提升软实力。

以政治实力为基础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新中国历史表明,政治实力一直都是文化、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或衰弱的基础。新中国成立时,新的政治制度焕发了全中国人民建设新国家的热情,1950-1956年我国文化、经济、军事实力都迅速上升,赢得了朝鲜战争、完成了工业基础的建设,识字率迅速提高,道德风尚大幅改善。而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使国家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都严重衰败。而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使我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迅速提高,但一段时间内军事实力欠了些账,此后中央政府提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政策,于是出现了经济与军事实力共同增长的局面。2006年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我国的政治实力开始明显上升。根据我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以政治实力为综合国力的基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以经济实力为综合国力的基础。

增强政治实力的工作从建立和谐社会入手。政治实力包括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但国内政治动员能力是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根本。提高政治实力与提高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原理一样,都得从先提高国内实力开始。只有一国内经济实力增强了,其国际经济影响力才能上升;只有自身军事实力增强了,对国际安全事务的影响力才上升。当一国政府的对内政治动员能力下降时,其国际政治动员能力也必然下降。建立和谐社会是提高我国政府国内政治动员能力的根本大计,因此增强政治实力的工作应从和谐社会建设入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明确,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正义与公平。以“正义公平”的思想替代“致富光荣”的思想指导我国政府的各项政策,政府的信誉就能迅速提高。为此,当发财致富与公平正义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维护公平和正义。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原载《环球时报》2007年5月22日第12版)